

◀（上接 10 版）

至,对人类过去的历史陈迹,很感兴趣。《回忆梁启超先生》,叶树勋编《杨鸿烈文存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)

梁启超不算有收藏癖的人,他居然也藏有埃及残石。

从黄遵宪到康、梁,其收藏都不属于学问性质,但仍算得上埃及文物收藏史的片断。

二

潘佳先生引叶昌炽《语石》卷二里的一则,专门论述潘祖荫收集埃及石刻事。而同样性质者尚有罗振玉《埃及碑释序》:

光绪初叶,湘乡郭筠仙(按:即郭嵩焘)侍郎奉使泰西,吴县潘文勤公(按:即潘伯荫)门生有随使归者,为文勤公言埃及文化最古,其金石刻辞有在三千年以前者。文勤闻而欣然,函驻英使馆为之购求。顾以西律禁止古物输出,仅得以石膏抚(按:“抚”疑为“撫”之讹,即“模”)拟埃及古碑一。致之京师,文勤欲求西儒为之考释,不可得也。乃取以贮之江苏会馆,此埃及文字流传我国之滥觞。

越三十年, 溧阳端忠敏公(按:即端方)采风于欧洲列邦。忠敏好古, 固与文勤相颉颃,始购埃及大小石刻十余品,得彼国之许可,舶载而归。然欲为之考释,亦不可得也。及辛亥国变,忠敏既殉节西川,曾不十稔,遗物星散,埃及诸刻亦入市贾之手。

山左慕君元父得古棺盖一,而苦其不可读,以示美国杜耳博士。博士为转乞埃及学家达拉塞氏,以法文译之,博士又译以英文,而邮致慕君。慕君之友,北京大学教授李君泰荃者,于中西史事,功力至深,复就博士所译,译以国文。乃知此碑实立于欧洲纪元前三百年,当埃及多李贾王时,远值我周秦之世。慕君既展转译其文,复谋精印以传之,而微序于予。……(《贞松老人外集》卷一,收入《罗振玉学术论著集》第十集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)

照罗序所言,“埃及文字流传我国之滥觞”仍是潘伯荫之功,只不过年代更早,说他在郭嵩焘驻英时代就向使馆求助,并得到埃及碑刻的石膏模本,这是叶昌炽没有言及的。

叶著《语石》成书于宣统元年(1909),而罗氏《埃及碑释序》写于民国壬戌年(1922),去潘伯荫已远,但考虑到罗氏对古物事项的熟悉,其记录仍值得重视。至于罗序所述的慕元

父,其人不见于经传,但他收藏埃及古棺,且编刊《埃及碑释》,自然也是中国人收藏、研治埃及文物的一页——据张晓川文,此书刊行时定名为《希腊埃及时代棺铭考释》。

我原先因见到罗氏《埃及碑释序》,就想查找慕元父编刊的《埃及碑释》,无意中检索到另一种论著,题名亦作《埃及碑释》,署“归安陈其镛骏生译录”,内文则题为“埃及古王特勒枚立约碑译略”,“全书”仅一页,第一段云:

西历一千七百七十九年,法人在陆塞他海口(埃及地)得此碑,镌字三段,上段埃及古文,中段埃及近文,下段则希腊文也。考古之士递加究证,历四十余年,至我朝嘉庆开始繙译成篇,盛行西土。惟其年代尚不可得,盖夷俗子因父名,有数世不易者,故碑中虽见王名,无从编订,约其时亦在中国秦汉之际,而其文义朴陋,译兹大略于后,以见彼族是时风俗,亦可为考古之一助耳。……(原载《振绮堂丛书》二集,收入《丛书集成续编》第216册,[台]新文丰出版公司)

按:此处所说的“陆塞他”显然即罗塞塔(Rosetta),1799年法国占领军于此发现著名的罗塞塔碑(作者将碑刻的发现时间误作1779年)。此碑以埃及圣书体、世俗体及希腊文三种文字书写,为释读埃及古文字的关键,在埃及学史上声名赫赫。

关于罗塞塔碑,郭嵩焘在日记中已有提及:

埃及古文极类中国篆籀,西洋数千年无识之者。……近数十年罗尔塞得斯多姆有掘得古石碑者,一面希腊文,一面为虫、鸟、方斜之形,西洋以为古画也。法国人山波里安以希腊文推测之,凡一二字同者,二面文皆合,因而辨知为埃及古文。得此石柱及埃及各古碑,审其同异,辨其文义,相与接踵而衍演之,以成《埃及字典》一书。(《伦敦与巴黎日记》,第452-453页)

此处的“罗尔塞得”(钟叔河谓“罗尔塞得斯多姆”意为罗尔塞得之石,郭嵩焘误作地名),即罗塞塔;“山波里安”自是大名鼎鼎的商博良(Champollion),至于《埃及字典》,应指其遗作《圣书体文字辞典》(*Dictionnaire égyptien en écriture Hiéroglyphique*)。

这样的话,郭嵩焘或是中国人最早提及罗塞塔碑者,而陈其镛或是中国人最早将罗塞塔碑碑文中译者。

此外,关于端方搜集埃及碑刻事,还可补充一些民国初年的零星材料。

况周颐笔记有《埃及古碑》一则,前半系剿袭叶昌炽《语石》,转述斯宾塞尔《群学肄言》

所载摩阂伯断碑事,后半云:

吾中国石刻,以周宣猎碣为最古,后于此断碑,殆犹数百年。然埃及诸石刻,则尤夙乎邈矣。托活络忠敏(按:端方为满人,“托活络”系其姓氏)藏埃及碑数十石,多象形字,若禽鱼亭台云物之属。又有古王及后像,王像长躯巨目隆准,轩昂而沉鸷,后亦隆准,短小而权奇(王像高今尺一尺二寸五分,后像高八寸三分,皆半身像,阳文)。忠敏题云:五千年外物也。(《餐樱庖随笔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,第98-99页)

又鳧道人(李葆恂)笔记《埃及古刻》一则:

端忠敏公出洋考察政治时,归途历埃及,得石像百余事,亦有以瓷瓦为之者。中有一石,高二寸余,广半之,上刻一女子作乳儿状,赤身散发,势极恢奇,足甚尖,如吾国纤足,尤不可解。有字数十,又似花纹。公见予爱之,遂以见贻。欧洲考古家谓是五千年前物云。(《旧学庵笔记》,[台]广文书局民国59年版)

此皆可见端方收藏埃及文物之一斑。

周肇祥在记述端方遗物时,亦涉及埃及文物事,并发议论:

……埃及古棺一漆而饰彩,一似石非石,皆不类千年前物,惟刻石尚有真者。中国人好外国古董,正如外国人买中国贗物,理所当然耳。(《琉璃厂杂记》十九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,下册第705页)

不过周氏有点想当然,因为国人搜集的埃及古物本多复制品,当事人未必不知。

还有,王襄有题跋《题埃及造像拓》:

……端甸斋考察欧洲政治,游开维(按:即开罗)得来甚伙,兹乃其一。今皆不知流落何处,拓墨亦难求。此幅买自李家故肆,是赠张鞠如士保者。张君长于治印,为端氏旧客,详其身世,增此拓绪闻。(《簠室题跋》第四册,唐石父、王臣儒整理《王襄著作选集》下册,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,第2044页)

按:检张士保(字菊如),系书画家,但卒于1878年,其时端方尚是少年,更不可能开始搜集埃及文物。故王襄所题者,或系端方遗绪,但受赠者当另有其人。

三

中国人甫一接触埃及及其遗物,就很关注其文字,并与汉字对照。文字学(小学)在中国有深厚传统,至清代尤为

显学,而且汉字与埃及文字(圣书字)皆有直观的“象形”特征,中国人自容易有“惺惺相惜”的反应。

王韬赴欧途中游历埃及时有言:

西人以埃及所传为上古文字,曾经英法博学之士细为推究,而知其系象形为多,或间有同中国蝌蚪籀篆文者。可知原始造字之意,六者俱备,原无分于中外也;自后世杂学纷歧,竞趋浅易,而古意亡矣。(《漫游随录》卷一“改罗小驻”,第80页)

光绪二十年(1894),宋育仁随公使龚照瑗出使欧洲,其诗《浮海至巴黎纪程百韵》有云:

文教自东来,铭刻犹可搜。粵稽虫鸟篆,遗取绝代轡。欲谕象胥言,恐诂众楚咻。(自注:“……河岸西为埃及,山川清秀,旧时石刻存者尚多,土人影照出售。字体繁重,多画虫鸟形,字直行,与西文旁行者异。埃及在中为西,在西为东,疑三代象胥谕语言所及。”)(张煜南辑《海国公余辑录》卷四,2005年影印本)

又其《泰西各国采风录》记述更详:

泰西文字推法国,法文本于罗马,罗马本于希拉,希拉本于埃及。埃及即麦西,分为犹太,实西方文教祖国。过波赛,买埃及古文石刻,审其文,以形相合,体甚繁重。西文主音,埃及文主形;西方旁行,埃及文直行。至伦敦,闻有麻翁者,为博古学士,能识埃及文。访之,出所携石刻相示,渠亦不能读其文,但言埃及字凡三类:有模绘法,如画虎示虎;有定实法,如画妃别于王;有从音法,贤异于权之类。此三体者,古人混用焉,今惟有音,令人易晓。……埃及石刻,据麻称,为开辟四千年前古文,以时按之,则夏末商初时也。其文三体,于古先所称六书,为象形、象意、象声,而无指事、转注、假借。指事原与象形一类,而义更隐微,疑埃及古文亦有此体,而西人说字不能通其意,遂混入模绘一类;转注、假借,以体兼用,即在四体之中,亦所应用,特西士未及知耳。

另一处云:

梵字旁行、主音,与西文为一派;中文直行、主形,与埃及文为一派。埃及为西方文字之祖,其兴在夏商间。中国开辟最先有结绳传音(结绳之治,当略如外国字母,以数形转移,相结传音),易之以书契;外国开辟晚,先由中国流传书契后,易以点画传音。《周礼》外史掌达书,名于四方,即同文敷教之事,故名教之兴,自近而远。西国博士多考求埃及古文,在英识一博士密腊(即麻翁,见前),与议制

通行各国字典,以中国古文为主,间采合埃及古文,曾拟条例遗之,密是其言。(此据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,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影印版,第19册。按:钟永新考订“麻翁”即以比较宗教学驰名的麦克斯·穆勒[Friedrich Max Müller,1823—1900],时地及身份、年岁皆合,其说可从[《麦克斯·穆勒与宋育仁的学术交往录》,《宜宾学院学报》2011年第10期]。不过他未引此条。由此条可见,“麻翁”之“麻”,应为“Max”对音的省略,而此处“密腊”则为“Müller”的对音)

文廷式《纯常子枝语》(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79年影印版)涉及埃及处亦不少,且特别关注文字问题。卷七有云:

《古教汇参》卷一云:“埃及书法略同中国,亦分为六……韦廉臣乃英吉利人,所说当必有所本,于中国小学未能尽通,然即此可知象形、会意实为文字之本。今埃及古文所存无多,各国亦无能读者(亦《古教汇参》语),徒以二十六字母,贯一切音,并合纪事,则谓西洋各国有声音而无文字可也。”(按:《古教汇参》系英国传教士韦廉臣撰,董树堂译,卷一专述埃及事,译作“埃及纪略”,收入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)

又卷十二:

《古教汇参·埃及纪略》云:埃及例每有死亡,各以其书殉葬,最古中有二三卷,约在中华陶唐以上。

按:此当指著名的《亡灵书》(又译《死者书》)。同卷又云:

《列国政教考略》云:“文字之兴,埃及最古,亦有谐声、会意、象形数巧,各分字母,各从其类,凡喉、腭、舌、唇,颇能讲求。如写鸛鴒,则绘一鸟,其字音为诚是之意。所用之纸以芦为之,今坟墓犹有存者。”(按:《列国政教考略》未详)

同卷又云:

李凤苞《使德日记》云:《新报》主笔爱孝尔示以埃及文字,并讲解其字典。不外象形、假借、转注三类,其假借又多反用之字,如中国“扰兆民”作安字解、“乱臣十人”作治字解之类。爱君亦谓埃及与中国古文实为同源。

同卷又引宋育仁《采风记》,已见前引;又卷三十三引英人《万国通史前编》论埃及繚神(日神)事,兹不具录。

王韬、宋育仁、文廷式对于埃及文字了解无多,其看法基于士人一般的小学素养,大体属于印象式的,各有参差,不必一一细究。相对值得留意的,是关于埃及文字与汉字的关系问

(下转 12 版) ➡